

定窑宽芒口瓷器装烧工艺探识

□ 白庆林

芒口,是定窑采用覆烧法烧造瓷器的一个典型特征。定瓷芒口一般都留在器物(圆器)口沿的端面及内侧,这是由于该部位是与覆烧用的支圈所接触的地方,为防止粘连而不能带釉焙烧。根据器物大小,工艺精粗,芒口宽度多在1~4毫米之间。为了不影响美观和使用,器物口沿外侧几乎见不到旋削芒口的痕迹,或者极少。而有一类定瓷则是将口沿外侧旋削很宽的芒口,并与端面及内侧芒口连成一体。外侧芒口宽度窄的大约5毫米,宽的近20毫米,绝大部分在8~10毫米。器型均为弧腹、近口沿外撇的圆器。宽芒口就出现在口沿外撇处(图一)。在河北省曲阳涧磁村和燕川村定窑遗址都曾发现宽芒口瓷器标本。

上世纪80年代,有学者提出,宽芒口器是定窑工匠在覆烧法早期所创,即利用宽芒口,将圆器仰挂在支圈上焙烧,其后才有了覆烧法^[1]。根据此说,今天曲阳一些小窑仿烧了宽芒口瓷器,结果发现“支圈仰烧法”在烧造实践上根本行不通^[2]。所以近年有学者对“支圈仰烧法”提出质疑^[3],但对定瓷宽芒口的成因,又都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,使之成了一个谜。

近年来,为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,北京金中都遗址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基本建设,在金代土层

中出土了大量定瓷残片,而每个工地几乎都有宽芒口定瓷残片出土,尽管其所占比例较小。宽芒口定瓷大多以光素为主,少量刻划有萱草、莲荷、游鱼、双鸭等纹饰(图二)。至今似未发现印花宽芒口定瓷^[4]。此外,近年在北京房山金陵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宽芒口定瓷碗^[5],该碗内刻划萱草纹(图三)。经考辨,以此纹样和技法装饰的定瓷为金代流行产品^[6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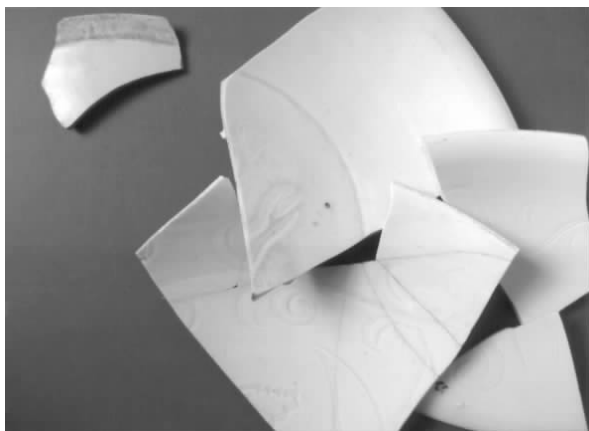
宽芒口定瓷不但在口沿外侧留有芒口,而且口沿内侧及端面与其他覆烧定瓷一样,也都留有旋削的芒口。这就使人对前面所提到的“支圈仰烧法”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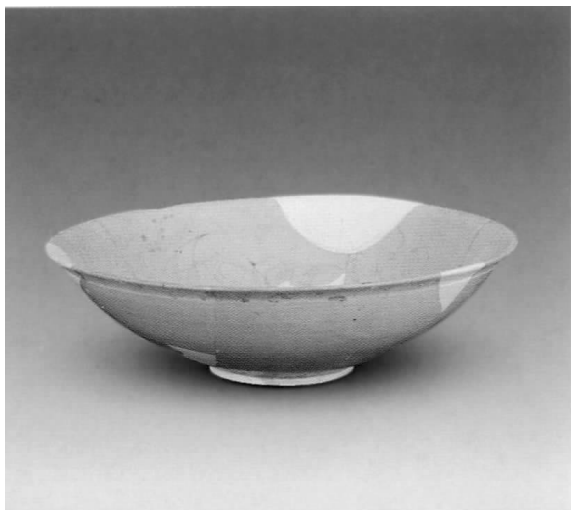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 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定窑宽芒口瓷器标本 1



图一 定窑宽芒口碗(故宫博物院藏)



图二 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定窑宽芒口瓷器标本 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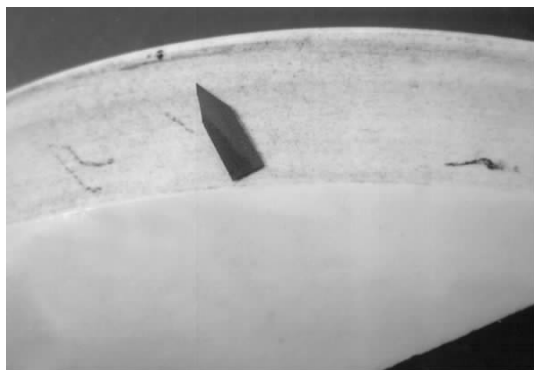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 北京房山金陵遗址出土定窑宽芒口碗

说产生了疑问。仰烧在烧成工艺上是否可行姑且不论,就其口沿内侧旋削芒口这一点,就令人费解。因为,既然是仰烧,口沿内侧不与支圈接触,是无须旋削芒口的。这样既不美观又费工时。也许有人会说,这样做对在芒口上镶金银铜扣不是更为有利吗?其实,就北京地区出土的成千上万片定瓷来看,包括金宫城遗址内出土的贡瓷,都只有极少数可看出镶扣的痕迹。镶扣只显高贵作用,食用时并不方便卫生,况且外撇的口沿、宽大的芒口都会增加镶扣难度与用料,因此镶扣的说法也不能自圆其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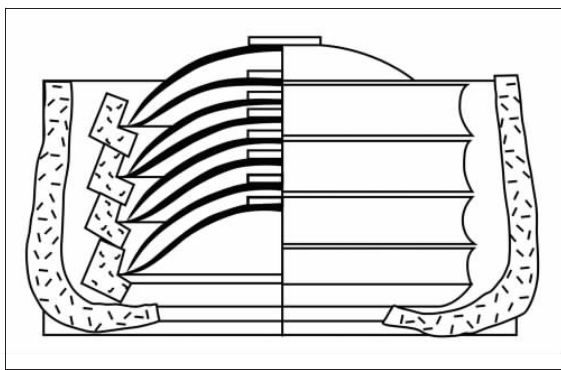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宽芒口定瓷在工艺处理时保留了普通芒口定瓷的基本特征,那似乎只有一种理由可以解释,即宽芒口定瓷仍是采用覆烧法烧成。这从出土的定瓷残片中也可得到证实,如有的芒口因正内侧部位釉层处理稍差,留下一丝与支圈或其他瓷器粘连的痕迹(图四),有的在宽芒口上还残存些许釉滴。而且仔细观察,会发现有的宽芒口瓷器上部积釉较

厚,向下逐渐稀薄。这些似乎都表明,宽芒口定瓷同样也是采用覆烧法烧成。其具体做法可能是:覆烧时将器坯外口沿芒口延宽到支圈宽度(大部分“V”型支圈内台宽度为6~8毫米),芒口之上再覆扣一件与之相配的器坯,即以宽芒口代替支圈使用(图五)。这样,既节省了宝贵的瓷土资源,又减少了支圈的使用。根据这一推测,再来看宽芒口器物口沿均呈外撇状的现象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其一,口沿外撇能更好地起到横向展宽芒口的作用;其二,增加力度,更好支撑上面覆扣的器坯;其三,由于宽芒口断面呈凹槽状,还能对上面覆扣的器坯起到定位作用。至于上面覆扣的器坯,极有可能是口沿不外撇的普通器型者。当然,覆扣同一器型的器坯在工艺上也应当是可行的。

覆烧是为提高窑炉的单位产量与工效而发明的一种装烧方法。定窑在北宋晚期发明支圈组合式(一坯一圈,层层相叠)覆烧法后,虽然在窑炉装烧数



图四 宽芒口代替支圈使用时留下的痕迹



图五 宽芒口瓷器覆烧示意图

量、热能利用方面有了质的飞跃,但为了保证烧成质量,避免因收缩率不一致而导致瓷器变形,覆烧法采用的支圈也要用同等的瓷土制成。这样,只能一次性使用的支圈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——定窑遗址现存的十几座堆积如山的“渣堆”便是明证。在这些“渣堆”中,最多见的就是覆烧常用的“V”型支圈。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,定窑“V”型支圈组合式覆烧法的普遍应用是在金代中晚期。定窑在扩大生产,增加产量的同时,也面临着瓷土资源日益减少的危机^[7]。为节约原料,提高工效,工匠们必然会尝试发明其他更为经济的覆烧法,而宽芒口装烧工艺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^[8]。

宽芒口装烧工艺虽然可以节省原料和工时,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。由于工艺上的要求更加严格,操作上稍有差池,就可能前功尽弃。此外宽芒口从外观上也逊色于普通芒口定瓷,经济效益当不会太显著。因此,宽芒口瓷器产量可能较小,生命力也不会长久。在金中都宫城遗址范围内,极少发现宽芒口定瓷残片,这也说明了这类瓷器多供民间使用。

综上所述,可以认为:宽芒口定瓷采用特殊的覆烧法烧成,而所谓“支圈仰烧”一说是不能成立的。据北京地区金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定窑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看,宽芒口定瓷的烧造时间并非覆烧早期(北宋晚期),而应在金代中晚期。或许正是在定窑产量大幅增长而瓷土资源日益减少的背景下,定窑工匠才发明了这种更为经济的覆烧新工艺。

绘图 穆建伟

[1] 李辉柄、毕南海《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》,《考古》1987年第12期,第1119—1139页。另,叶喆民、刘毅等也有类似说法。见叶喆民《中国陶瓷史》,第八章第一节,第235页,三联书店,2006年;朱凤瀚等编著《文物鉴定指南》,第87—88页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95年。

[2] 由于器坯口沿处甚薄,高温烧成时难以承重。李辉柄、毕南海文中也认为,采用支圈仰烧法,器坯在“烧制过程中容易塌陷而成为废品”。

[3][6] 刘涛《宋辽金纪年瓷器》,第7页,文物出版社,2004年。

[4] 印花瓷器因模制成型,规格统一,可能不适宜于宽芒口瓷器成型与装烧的需要。

[5]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《北京金代皇陵》,图六九—1,彩版1—2,文物出版社,2006年。

[7] 瓷土资源枯竭当是导致定窑最终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[8] 在北京地区出土的定瓷中,还发现一枚与宽芒口器型一样的瓷片,它未留有宽芒口,却在器身削去一圈釉层,露出宽约2厘米左右的胎体。估计烧成时其上再覆扣一件相配套的瓷器,起到宽芒口一样的作用。此种情况极可能发生在覆扣瓷器的顶层。

(作者工作单位 北京市宣武区北京钢琴厂)

(上接 20 页)

流釉结晶。盘口,直颈,溜肩,鼓腹,平底内凹。肩部饰对称桥状四横系,器表印有麻布纹,造型工整,布纹清晰。高21.2、口径9.7、腹径22、底径16.4厘米(图一)。

型 2件(M1:10、17)。形制相同,大小不同。内外施青灰釉泛黄,外不及底,釉层厚。直口,平沿,斜肩,肩部对称附桥状四系。M1:10,口径4.6、腹径10.8、底径6、高9.3厘米(图二)。M1:17,口径8.1、腹径18.1、底径9、高13.5厘米(图三)。

这3件西晋青瓷罐有胎色不够洁白,釉层厚薄不均,青釉不够明亮且泛黄闪绿,在流釉处呈凝珠状,凝珠处颜色深黑等缺点,与后代的传世精美青瓷器相比,虽带有少许原始的色彩,但已具备了成

熟青瓷的特征。

这3件青瓷罐从釉色、从式样,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确实的物证,虽然郑铁经济房晋墓内出土的这3件青瓷器的产地和窑口尚不能确定,但它们的出现肯定地告诉我们,它们可作汉至北魏间数百年中原地区陶瓷历史的新桥梁,上承汉代青黄釉陶的优秀传统,下启隋唐二代北方的三彩陶。

这3件西晋青瓷的发现,为研究中原地区青瓷发展系列的贯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,为中原地区青瓷的发展、变化及与唐代成熟青瓷的关联搭上了衔接之桥。

(作者工作单位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)